移民社会

绿营兵与清代云南移民研究

秦树才　田志勇

[摘要] 绿营兵的招募、调遣、汛塘分布及其变化，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不断加强，决定了绿营兵与清代的移民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性。绿营兵及其家属不但在云南形成了三种移民类型，造就了三十八万多人的移民，而且还对清代民间移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绿营兵　汛塘　清代　云南移民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4) -03-0032-09

Green Standard Army and Migration in Yun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enlistment and deployment of Green Standards,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xun and tang, as well as the Qing government's increasing control over frontiers, determined the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Green Standards and migration problem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oldiers of Green Standards and their dependents not only shaped three types of migration in Yunnan, resulting in 380,000 migrants entering Yunnan, but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role in popular migra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移民作为清代历史的显著现象，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目前，清代移民史研究的成果已很丰硕，但因绿营兵研究的极度薄弱及绿营兵"兵皆土著"[①]的看法，学术界尚乏从绿营兵角度探讨清代移民之论著，成为清代移民研究的一大缺憾。本文以绿营兵分布的重要地区云南为例，对绿营兵与清代的移民问题作一力所能及的探讨，意在扩展我们对清代移民原因、渠道、内涵的认识，同时揭示绿营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绿营兵与云南移民的必然联系

首先，从绿营兵的招募、调遣看。绿营兵是清王朝在八旗兵力不足，难以控驭全国的情况下而招募汉族人组建的又一正规武装。对此，罗尔纲先生指出，清朝建立绿营兵的原因，"第一，八旗军队数量过少，所以不得不用汉人军队"；"第二，清朝建立绿营是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政策来统治中国"。[②]所以从清初开始，"绿营最初编制多为明代降军及各省收编队伍"[③]。从清代绿营兵的实际构成看，尽管绿营兵中有少量回族，但其主体仍是汉族，罗先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为了实现对以少数民族聚居为特点的广大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必须从内地招募汉族组成绿营兵派赴边疆，这是绿营兵与移民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就云南而言，虽然汉族人口在明代即已成为云南人口的主要部分，但与内地相比，在封

[收稿日期] 2003-11-10
[作者简介] 秦树才 (1963—)，男，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昆明 650091；田志勇 (1965—)，男，红河学院副教授，蒙自 661100

建统治者眼中，云南仍然是“苗夷杂处之区”[④]，“猓猡、僰民、野苗等种类繁多”[⑤]仍然是云南民族构成的主要特点。要统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别的云南各民族，清政府必须从内地向云南调派绿营兵。

其次，从云南绿营兵建立的实际情况看。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平定云南前，大西军余部、南明抗清力量、云南各民族结成了反清复明的最后阵线。平滇后，清政府当然不可能完全利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云南各族人民来作为统治云南的工具，云南的绿营兵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由内地调拨而来。康熙十二年（1673）至二十年，吴三桂等发动了反清叛乱，“滇省各营兵弁，向被吴逆煽惑，变乱四起”，是吴氏主要依靠力量之一。在清统治者眼中，这些绿营兵，“当日从逆之时，肆恶狂逞，其荼毒生民，抢掠地方，凶顽相习已非一日”。因此，不少官员对其心存戒意，惟恐他们“身在地方已久，山川之险处处深晓”，他日又依险造反，重新威胁大清的江山。因此，在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政府对“一切投诚兵丁，严汰老弱，其余有应补伍者，止准用为步兵”，相反，对进征云南的各省绿营兵丁，“有情愿在云南食粮者，即准酌派于本地”[⑥]。这样，从云南绿营兵创立和重建时中央王朝与云南地方存在的对立形势及清恢复对云南统治后所面临的复杂情况看，清政府吸收内地兵民，充实云南绿营营伍，加强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力量就势所必然了。

第三，从清王朝控制云南的历史轨迹与云南绿营兵和汛塘[⑦]分布的发展趋势看。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末年，清政府两次平滇后，都把绿营兵和汛塘布置于云南的滇池、洱海等腹里平坝地区和交通要冲之地，“扼要制胜”，“积威控御”[⑧]，目的是集中力量，稳定中心，再以中心制全局，实现乱后对云南的控制。其后，经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缅冲突的解决，清王朝对云南的控制趋于稳定，对云南的统治由控制中心、统驭大局转向对包括边疆和山区在内的更加广阔地区的深入统治。相应地云南的绿营兵和汛塘分布也由中心区和腹里地区推向边疆和山区，并最终形成了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格局。这样，云南的绿营兵又构成了由云南内地向边疆迁移人口中的重要部分。

二、绿营兵在云南形成的移民类型

由于以上历史原因，绿营兵是清代云南移民的一个重要渠道，绿营兵丁构成了清代云南移民的重要部分。大体说来，云南以绿营兵为中心的移民活动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内地汉人因绿营招募和调动向云南迁移。这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最早出现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初年云南绿营兵的初建时期。这时的云南绿营兵包括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忠勇、义勇中左右前后各五营，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云南提督标兵，临元澂江镇、曲寻武沾镇、大鹤丽永镇、景蒙楚姚镇、广罗镇、永顺镇六镇，元江、腾越二协，寻沾营，共53,000名兵丁。[⑨]其大体来源是：1、将各省平滇绿营兵丁的一部分留滇驻守。《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载：顺治十六年九月乙亥，将征云南经略右标提督总兵官右都督张勇、辰常总兵官杨遇明、经略前标总兵官左都督南一魁、剿抚四川右路总兵官都督同知马宁、湖广左路总兵官都督同知张国柱、署剿抚四川左路总兵官沈应时、广西全州总兵官署都督佥事刘应志、湖广祁阳总兵官都督佥事陈德、益阳总兵官都督佥事马鹞子、管经略前营火器副将王永祚等“留镇云南”。而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则明确指出：“顺治十七年十月，吴三桂请设援剿四镇，总兵以四川左路总兵官马宁、右路总兵官沈应时、湖广益阳总兵王辅臣……充之。又以经略左标提督张勇充临元镇，湖广左路都督张国柱充永顺镇，中路总兵阎镇充大鹤丽永镇，火器总兵王永祚充蒙景楚姚镇……祁阳总兵陈德充曲寻武沾镇。悉带原兵留镇……诏许之。”则援剿四镇中的三个镇、临元镇、永顺镇、大鹤丽永镇、蒙景楚姚镇的绿营兵丁基本由四川、湖广、广西等省的绿营兵留驻组建。2、收编大西军和南明降兵组建。从全国情况来看，绿营最初编制多为明代降军及各省收编队伍。清军入滇时，也收降了不少南明军队。如顺治十六年三月，“伪将

狄三品、艾承业、张明志、丁友才等投诚”。六月，“伪将王会、杨威等率属归附”。十月，“伪将李如碧、高启隆、马惟兴、马宝、吴子圣、廖鱼、郝承裔、杨武、杨国明等悉降”。顺治十七年十月，“伪将祁三昇降”。十八年十一月，吴三桂又在木邦“分兵追白文选于茶山，降之，并降其党万人”。直到康熙元年八月李定国于景线去逝后，“其将马思良、胡顺都、王道亨以李定国子嗣兴及刘文秀子震来降，众悉平”[10]。对于这些来降之众，清政府多将其编为云南的绿营兵。如吴三桂藩下的忠勇中左右前后五营，“总兵以投诚马宝、李如碧、高起隆、刘之复、塔新策五人充之”，义勇中左右前后五营，“总兵以投诚王会、刘偁、马惟兴、吴子圣、杨威五人充之”。援剿四镇中的一镇也是以投诚杨武充总兵。广罗镇则以投诚狄三品作总兵官。[11]各投诚官弁下，一般都仍领有其旧部兵丁。顺治十七年七月，经吴三桂疏请，其收降兵丁组成了忠勇、义勇中左右前后十个营。[12]另外，康熙元年二月癸丑，投诚后被任命为广罗镇总兵的狄三品病故，云南总督赵廷臣上疏请求选补，康熙帝降旨说：“狄三品投诚功大，其标下官兵不应令他人管辖，应令伊子或伊兄弟接管。”[13]说明南明降将仍领有其旧部。这样，通过吸收抗清队伍入绿营兵，因战争关系而进入云南的大西军武装和南明所属官兵被较稳定地安置于云南。当然，南明军队中有一部分是在云南招募之人。他们虽不属省外入滇移民，但也因被纳入绿营营伍而由原籍派驻各绿营驻地，形成了云南省内人口的迁移。3、吴三桂藩属之绿营兵。吴三桂被留镇云南后，为控制云南，也为发展其势力，除领有其8,400名汉军八旗外，也把在平定陕西、四川时招募的绿营兵丁带入云南。《清世宗实录》卷一三六载顺治十七年六月，“平西王下……绿营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在这条记载里，吴三桂所统绿营兵与在云南所收的“投诚兵”系并列关系，说明这些绿营兵是吴三桂入滇前即已组建而带入云南的，并非到云南后以投诚兵丁组成绿营兵。总之，以上三个来源的绿营兵形成了清初入滇移民的主要部分。

以绿营兵方式移民入滇的第二个时期是三藩之乱平定后云南绿营兵的重建时期。在平叛期间，清政府即开始组建云南绿营兵。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帝任命湖广提督桑峨为云南提督，四川总督周有德为云贵总督，李天浴为云南巡抚。[14]康熙十九年，又以陕西提督赵良栋为云贵总督。[15]随着云南总督、巡抚、提督的重新设置，也相应地配备了所统辖的绿营官兵。如云南提督桑峨由其原辖之湖广提督标兵改作云南提督标兵[16]，云贵总督赵良栋所辖标兵则以其任陕西提督时所辖标兵五千名为基础，以前任云南总督周有德标下随征之兵和进征云南途中收降的“投诚支粮之兵补入”[17]。康熙二十年正月丙寅，康熙帝又命以候补总兵官马山、偏图为云南总兵官[18]，相应地配备了所属绿营兵丁。可见在平定云南之前，清政府就挑出湖广、陕西等处绿营兵中的一部分着手重组云南的绿营兵。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底，三藩之乱平定后，就如何组建云南的绿营兵，江南道试监察御史陈文学在《为请详议调度滇省兵将事题本》中提出：“云南投诚各官，一概不准留用于本省……至于一切投诚兵丁，严汰老弱，其余有应补伍者，止准用为步兵……其现在出征云南绿旗兵丁内，有情愿在云南食粮者，即准酌派于本地，各营使其新旧相间，得以易制，则管辖得人，险要无虞。”[19]此题本于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该部知道”，最终是否实施则不得而知。但它代表了当时朝野内外不少人对战后云南绿营兵重建的看法，对当时的决策起到很大的影响。从对逆属之人的处理情况看，清王朝确以此原则行事。如康熙二十一年，诏令“移吴逆亲属家口及伪将军总兵副将等进京，参游以下俱发河南、江西、山东、湖广四省安置”，说明清政府为使乱后的云南“根株净而萌蘖不复生”，确实对从逆之人心存戒备。对前来投首的逆属之人，当时的云贵总督蔡毓荣以“愿在他乡入籍者，写明作何生理；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给田亩开垦；愿为兵者，补入营伍”[20]，加以消化处理。补入营伍只是三种安置渠道之一。由上可知，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以叛乱而又前来投诚的包括原来云南的绿营兵在内的从逆之人来单独重建云南的绿营兵。则当有不少从征云南的他省绿

营兵留驻云南，成为重建后云南绿营兵中的一部分，形成以绿营方式而移民入滇的第二次高潮。

这次入滇的绿营兵除包括入滇前由湖广绿营兵组建云南提督桑峨所属标兵，由陕西绿营兵组建的云贵总督赵良栋所属标兵外，从四川、湖广、广西三路进兵云南的绿营兵中当有不少留为云南绿营兵，尤其是康熙二十一年，自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后被任命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处所有各省调拨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平定云贵的原湖广总督蔡毓荣被委任为平叛后的首任云贵总督时，其随征兵丁留滇者当很多。这一时期从省外进入云南的绿营兵占云南绿营兵总数之大半。

以绿营方式移民入滇的第三个时期是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三十五年的中缅冲突期间。云南的绿营兵本来就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边界冲突，再加上这时云南的绿营兵又以“怯懦成习，不堪应用”[20]而名闻一时，故清政府不得不厚集兵力，入滇抗缅。冲突结束后，一部分绿营兵又留滇不返。较典型的是陕西厄鲁特兵丁和贵州招募调遣兵丁。乾隆三十二年，明瑞首先奏称：“云南绿营兵丁，习气颓靡已甚，若于办理缅匪事竣，将赏给陕甘官兵为奴之厄鲁特查出，移来滇省，分于沿边营汛，充补绿营马粮缺额，教以孳生牧放，以收其力，可成劲卒一旅”，获乾隆帝谕准。[21]第二年二月，陕甘总督吴达善即“奉旨于赏给绿营为奴之厄鲁特内挑选强壮男丁，拨往云南边汛，充当兵马。现在挑选三百四十名，均年在五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酌分四起，间二日行走”[23]。乾隆三十四年，这批厄鲁特兵丁就已经“调赴滇省充补绿营额缺”，并被“派往各防所坐卡牧马及随营行走”[24]。乾隆三十五年中缅冲突结束后，仅有60名厄鲁特被遣归热河[25]，其余均留驻云南。

至于贵州绿营兵，在乾隆三十三年时即有13,000名奉调入滇，较适应云南作战之需，“在军营甚为得力”，与怯懦成习的云南绿营兵形成鲜明对照。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卯，乾隆帝谕令：“现在云南逃亡兵额甚多，将来亦须补选，莫若将黔省新兵拨往顶缺，于事更为有益。著该抚广为储择，多多益善，不必限以五千之数。其入选新兵，有情愿即赴军营者，即遣行，其流寓等项应募者，自更无可系恋，于拨滇充伍，尤属相宜。著传谕良卿妥协经理。”[26]该年四月癸酉，乾隆帝又对贵州留滇兵丁给予特别的优待条件，如“情愿赴滇，永充该省额兵者，即准其顶食马粮[27]，人情自必踊跃乐赴……至黔省自去岁及今派赴滇省兵丁内，并著阿里衮等遍为询问，如将来军务告竣，有愿留滇补伍者，亦并给与马粮，俾得生计充裕”，贵州兵丁积极响应，“无不欢欣愿往”，很快就招募到“年力精壮”兵丁5,000多名。[28]至乾隆三十五年，这5,000贵州兵丁最终有4,000余名陆续拨赴云南。[29]

第二种类型，因绿营兵和汛塘分布重心由云南腹里地区向边疆的转化而形成的由云南腹里地区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这一类型的移民在清初云南绿营兵初建时期即已存在。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以教化、王弄等土司地设置开化府（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后，将原隶吴三桂的忠勇中、左二营归入新设之开化镇，所属兵丁2,400名由滇中地区移徙到了滇东南的开化府。康熙七年，云南地方政府将原设之大鹤丽永镇分为鹤丽镇和永北协，原驻腹里地区的义勇前、左二营兵丁2,400名划归滇西北的鹤丽镇。同年，清政府在嶍峨、新平二县改土归流后，也组建新嶍营进驻二县，将义勇右营的500名兵丁调派该营。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府、东川府，南部的普洱府、镇沅府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并把维西、中甸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将流官的直接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为保证对这些地区的稳定统治，清政府在上述地区布设了重兵。在昭通府、东川府设置了昭通雄威镇，直辖中左右前四营，兵丁4,400名，兼辖东川营、镇雄营，各辖兵丁1,200名，共设兵6,800名。在滇南地区则设普洱沅威镇，下辖中左右三营，兵丁2,400名。在滇西北的维西、中甸等地则设维西营，辖兵丁1,000名。这些兵丁，基本都从云南腹心地区调拨或征招派往。如雍正六年（1728）所设昭东雄威镇（即后来的昭通雄威镇）及镇雄营便是裁拨原驻扎于寻甸和罗平二州之援剿左右两协兵3,600名组建[30]，普洱沅威镇的2,400名绿营兵中，有

800名来自临元镇，200名来自大理城守营，400名由原招募派驻西藏察木多之部分兵丁内调拨而来[31]。维西营也是分别由鹤丽镇调兵400名，由永北营调兵400名，由剑川协调兵200名，组成该营1,000名之兵丁额数。[32]总之，雍正年间因绿营驻防变更而由腹里地区外移边疆的绿营兵总数达到了10,200名。

乾隆年间的中缅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清王朝认识到了边防的重要性，而以往云南绿营兵的布置又存在腹里地区营镇兵额"未免过多"，边疆地区则"原设官兵不敷防守"的弊端。因此，冲突结束后，清政府对云南绿营兵布防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方面裁汰云南内地绿营兵丁。先于乾隆三十五年，裁永北镇，改设永北营，裁曲寻、楚姚二镇，分别改设曲寻、楚姚二协，三镇共裁兵2,925名。又分别裁去云贵督标、云南提标之前后二营，裁兵3,160名。又将云贵总督兼辖的奇兵营兵丁200名裁归曲寻协管辖；将云南抚标兵及广罗协、新嶍营、武定营、寻沾营兵丁裁减1,144名。另一方面增加、充实边疆地区绿营兵。先后从内地所裁绿营兵内拨230名充实顺云营，拨530名充实腾越协，拨600名往龙陵新设龙陵营。[33]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又将驻扎永昌的永顺镇向外移驻腾越，改称腾越镇，由腾越原设兵丁1,500名加上永顺镇裁拨的1,500名，组成该镇3,000名的绿营兵额；将龙陵营上升为协，以其原设兵600名，加上永顺镇标裁拨兵840名、提标裁拨兵60名，共组成该协1,500名的兵额；永顺镇改为腾越镇后，将驻扎滇中地区的楚姚协的1,500名绿营兵中的700名移驻永顺镇原驻地永昌，组成永昌协，再裁拨督标兵400名、抚标兵80名、提标兵280名、鹤丽镇标兵340名、昭通镇标兵200名，共组成该协2,000名之兵额。[34]

经以上调整，云南共有6,451名兵丁由内地腹里地区（少部分由滇东北）迁移到了滇西南、滇南边境一带，实现了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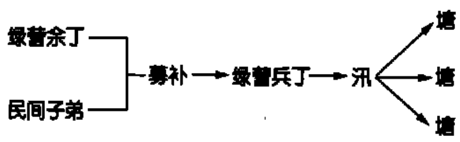
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因绿营兵而导致的人口迁移中，值得注意的是顺云协的设立和兵额的增加。此前，顺宁府是整个滇南边境沿线地区绿营布防最薄弱的地区，仅设一营1,290兵丁，嘉庆初年，顺宁府又发生了李文明等领导的拉祜族、佤族等族起义，迫使清云南地方政府加强了该府的绿营兵力布署。于嘉庆六年（1801）在顺云营增兵400名。十九年，又分别将云南提标兵65名、楚雄协兵100名、临元镇兵30名、元江营兵40名、永昌协兵70名、鹤丽镇兵30名、昭通镇兵60名、景蒙营兵40名，共435名拨归顺云营。道光初年，云南回汉互斗波及顺宁府[35]，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将龙陵协降格为营，将该协副将移至顺云，把顺云由营升格为协，相应地设兵1,796名[36]，从而使顺宁府的绿营兵额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因绿营调动而流入顺宁府的外地人口前后达到了835名。

此外在普洱府，在嘉庆初年到道光十二年（1832）云南全省裁汰绿营兵丁的大背景下，普洱镇反于嘉庆九年（1804）增兵768名，而裁兵之举则仅道光十二年裁27名。因此这一时期普洱镇的绿营兵额净增了741名。

总之，因绿营兵本身的裁减调动而形成的云南区域内人口由腹里地区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从康熙六年因开化镇的设立为始，到雍正、乾隆年间达到高潮时期，而嘉庆以后则逐渐减少、消失。云南前后共有23,527名兵丁因此而由腹心区域流向边疆地区。

第三种类型，因汛塘分布而形成的云南各地区内小范围的人口迁徙。以上我们谈到的第一、二种类型因绿营兵引起的人口移动，其规模、范围固然很大。但一旦迁徙结束，绿营兵的驻防便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在这种稳定状态下，当现役绿营兵丁因年力老迈、疾病、战事伤亡、溃逃等因而造成绿营兵额空缺时，为保证绿营营伍足额，绿营兵必须及时募补新兵。根据马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募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的绿营兵拔补原则，新兵的募补一般在绿营兵丁子弟组成的余丁和营协驻防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平坝腹里地区汉族中挑选体魄精壮之人完成。而这些被征招者，除部分驻协营所在城镇防守外，相当部分被分置于各汛塘，实现了人口在各地区内的流动。这种流动形态可图示如下：

因为绿营兵丁的缺额和补额不断发生，故以上人口流动模式也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动态过



程。况且，从清初云南绿营兵建立始，汛塘的设置数又不断增多，分布面不断扩大，到乾隆三十五年至咸丰五年间云南汛塘制度鼎盛时，云南各地设汛 308 处，塘 1830 个，全省绿营兵丁中有19,988 名分防于各汛塘。[37]随着汛塘的增置、扩散，越来越多的绿营兵丁由各地区中心地区向边缘、山区、交通沿线迁徙移动，在云南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因此，这一类型的人口流动虽然规模小、也比较分散，但却普遍存在，对清代云南的人口迁移具有重要作用。

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以上三种类型的绿营兵人口的移动并不仅仅是绿营兵丁本身的单独移动，其家小一般与兵丁一起随营居住，也随营汛的变更而迁徙流动。清初平滇，由内地各省调入云南的绿营兵丁是否迁家带口而来，在史籍中无明确记载，但从全国的情况看，清初入关时从他省招募移调充额的绿营兵士就已有携带家口赴军营所在地居住的情况。如顺治十三年（1656），湖南新设东安营，陈士彦、田见龙二人回河南召募绿营兵丁，结果田见龙召募官兵 430 名、家口 149 口，陈士彦召募官兵 507 名、家口 79 名，分别调拨湖南。顺治十八年，工部左给事中杨雍《请甦边郡疾苦疏》也称招募陕西兵丁入四川后，“复将抽调兵丁家口悉调移蜀省，使之完聚，诚所以系士卒之心，而图久安之略”[38]。云南绿营兵初建和重建时，所招入的外省籍绿营兵丁较多，其中当有已成家室者，为使这些绿营士卒安心戍滇，也必将其家口迁入云南。

雍正时期，当云南绿营兵由省内腹心地区向边疆地区调拨移动时，家口随营迁徙的记载便非常明确了。雍正五年（1727），从剑川营拨兵 200 名、鹤丽镇、永北镇各拨兵 400 名设立维西营时，雍正帝便谕令：“今兵丁移驻边远地方，搬移家属等项不可节省钱粮，必须丰裕足用，施恩前往。”[39]雍正六年，将援剿二协官兵等内地绿营兵调到滇东北组成昭通镇时，雍正帝又谕令兵部：“著照维西之例，交与鄂尔泰酌量远近，分别赏赉。”[40]雍正九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又上疏请求“一体赏给”普洱镇、乌蒙镇需搬迁家口兵丁“道途搬移之费”，雍正帝降旨：“应加恩恤……著照（鄂尔泰）所请给予迁移之费。”[41]可见，雍正年间，由内地迁往昭通镇、普洱镇、维西营等边疆地区的绿营兵都有搬移家口赴新驻地的现象。

乾隆三十五年后，清政府又先后加强了滇西南的绿营兵力，并最终建立腾越镇、龙陵协，由内地募补到的以上镇协的绿营兵丁也系搬迁家室前往，乾隆皇帝还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丁卯，同意了龙陵、南甸等处“新拨营兵搬眷之费，较近者酌给二两，最远者四两，次远者三两。再，拨永昌、腾越兵，亦酌量远近，分别办理”[42]。

总之，从清初内地即有异地召募绿营兵丁携眷前往驻地居住，雍正、乾隆时期云南各地绿营兵也都携眷调防、居住的情况看，绿营兵家小定居于绿营营地并随绿营驻地的变化而迁移应是清代绿营兵的一般制度。而这一制度又使因绿营兵丁的调动、迁移而在云南形成的移民数量变得更加可观。

三、绿营兵形成的移民数估算

关于清代绿营兵产生的云南移民数，目前只有曹树基先生有所涉及，认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总数为48,554 人，他们及部分家属由省外迁入，总计人口不会超过 15 万。[43]对于这一估算，笔者略有异说。首先，曹先生所用48,554 人的云南绿营兵数系引自罗尔纲先生《绿营兵志》，而罗先生又引自《清会典》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的云南绿营兵数，而乾隆二十九年距有外省绿营兵调入云南的顺治十六年（1659）和康熙二十年（1681）分别已有 105 年和 83 年。因此，以乾隆二十九年云南的绿营兵数来作为外省人口以绿营兵的调动或招募方式进入云南的移民数的估算基础并不恰当。第二，迁入云南的绿营兵及部分家属 15 万人之数显得难以让人捉摸。48,554 名绿营兵中有多少携家属入滇？作者未作估算，入滇之绿

营兵家属又以何种户均人口数标准作测算，作者也未作交待。第三，曹先生只考察了因绿营兵而由省外进入云南的移民数，未对因绿营兵的调动和汛塘的分布而在云南省内引起的移民问题引起重视。

事实上，我们要考察因绿营兵调动或招募而由省外进入云南的移民数，最应注意的是顺治十六年、康熙二十年稍后的云南绿营兵数，以及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中缅冲突期间调入并留居云南的省外绿营兵数。顺治十六年，到康熙元年绿营兵初建时，共有兵员53,000名[44]，其中以外省留滇之绿营兵和招降之南明和大西军官兵为主，只有极少部分为招募本地居民组成。因此，我们估计总兵额中80%由省外之人组成，人数为42,400名。康熙二十年云南绿营兵重建后，兵额为42,190名[45]，其中约半数为外省绿营兵留驻构成，半数为收降逆兵及招募云南本地之人，则约有21,095名为外地移民。而乾隆年间中缅冲突调入并留驻云南的绿营兵约5,000名。这样，清代前后由外省进入云南的绿营兵大概为68,495人。若半数兵丁携家小入滇，每户以4.84口计算[46]，有家口的绿营兵及其家属为165,758人，加上未携带家口入滇的34,248绿营兵数，由省外进入云南的绿营兵及家属共约200,006名。

至于由省内中心区迁徙到边疆地区的绿营兵，上文已作过统计，大概为23,527人，这部分兵丁已在原驻地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基本都建立了家庭，正如鄂尔泰所说的“调拨之兵，俱有家口在各标营”[47]。如果我们保守地按80%的兵丁有家室，每家5口计算[48]，则这些绿营兵及其家口总数达98,813人。

而因由各地招募，再因分汛设塘而分散到各地的绿营兵丁数，雍正《云南通志》所记为20,780人，若仍以80%有家口，每家4.84口计入，也有80,460人。道光十二年前云南汛塘兵丁为19,988名[49]，若也80%有家口，每家5口计算，应有79,952名。而当汛塘兵丁年老体弱或伤残后，所应募补的新兵除在本汛塘绿营兵丁余丁内补入外，也有一部分由其它地方民间招募而来，这些新募补的兵丁及其家人又在汛塘所在地形成一些新的移民人口。因此，实际上因分置于汛塘而造成的地区内移民数还会更大，其数额应大于9万人。

这样，因绿营兵而在云南形成的以上三类移民，其总数在388,819人以上。云南的人口总数，在乾隆二十年（1755）时，李中清据食盐销耗量估计为2,769,230人，嘉庆五年（1800）估计为2,854,315人。[50]如此，因绿营兵而直接导致的三种类型的移民数就分别占了以上两个时期总人口的14%和13.5%，比例不可谓不高。

四、绿营兵对其他类型移民的影响

在清代，府州县行政统治的确立、绿营兵的分防驻扎、封建教育的实施，是清政府对云南各地实施有效统治的三大标志。绿营兵作为清政府统治云南的重要工具，对云南社会的稳定、地区间交通的畅通和联系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云南很多地区，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由不毛之地、化外之区变成了移民安家、生息繁衍的乐土。而这一时期，云南内外又存在一些移民的条件和环境。首先，清政府对云南山区和边疆地区所开垦的“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之地，先是实施较优惠的田赋征缴政策，到乾隆三十一年最终将这种田地“俱著听民耕种，概免升科”[51]，免除了赋税负担，对移民入滇开垦耕种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其次，明末以来，玉米、马铃薯两种适应范围广、产量高、用途多的农作物品种传入云南，为移民开发山区、边疆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物质保障。[52]第三，从工矿业方面看，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采取了“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53]等鼓励矿冶生产的措施，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虽一度实施了放本收铜政策，抑制了矿冶业的发展，但雍正初年后，清政府又采取提高铜价，抑制短价收买等措施来鼓励矿冶发展。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规定生产者可将百分之十的产品作为“通商铜”自由出售，使铜的采冶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生产进入鼎盛时期，省内外众多的生产者纷纷流入矿区，形成巨大的流民潮。最后，清初以来，内地人口不断增长，对土地形成巨大压力，导致了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徙的趋势。[54]这些历史条件，使清代外省移民进入云

南以及云南中心地区居民向山区、边疆迁徙变得更加突出。据曹树基先生测算，大约在嘉庆、道光之际，迁入云南山地的农业移民至少有130万，以年平均增长率7%的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云南约有移民人口95万。[51]这些移民的形成和发展，与绿营兵对地方的保障和开发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普洱府"国初改土设流，由临元分拨新嶍营官兵驻守，并江右黔楚川陕各省贸迁客民家于斯焉，于人烟稠密田地渐开"[52]。又如昭通府，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也有一些汉人移居，但因人数少，进入之后"土司留配夷女，或因掳掠而至，积久与夷女相合，其所生男女，遂名为假汉人，崇尚夷习"，这些先期进入的汉族，由于人数较少，而不断少数民族化。雍正五年改土归流后，"筑城填籍，徙云（南）曲（靖）二府军民至昭，其原籍大都出于江南，此昭通汉人之一也；城工经始，举砖瓦泥木等匠，半皆召自各省，城工既竣，遂相率留籍而为昭通人；昭之北通蜀而东为黔，相距密迩，地当孔道，商旅辐辏，皆悦而藏于其市，安居乐业，著籍为民者，所在皆是；当乾嘉盛时，鲁甸之乐马厂大旺，而江南湖广粤秦等省之人蚁附麏聚，或从事开采，或就地贸易，久之遂入昭通籍；间有游宦来昭，留连斯土，如陕西齐晋辽左及其他省者，为数虽少，无非汉人之一种。休养生息，二百年来，故有八省客籍而铸成昭通之主要部分"[53]。可以看出，雍正年间昭通的改土归流及设流后绿营兵的进驻，封建统治的深入对汉族大量移居昭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独昭通如此，云南很多改土归流地区，原来统治力量较弱的边疆和山区也基本如此。李中清先生的《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一文曾对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到道光五年（1825）云南22个府中的17个府的人口发展情况进行过比较，其结果是："虽然中心区（按：含作为经济中心区的云南、澂江二府，作为次经济中心区的东川、大理、蒙化三府）和边缘区（按：含作为近边缘区的楚雄、广南、开化、临安、曲靖、武定六府，作为远边缘区的广西、景东、丽江、普洱、腾越、顺宁、永北、永宁、元江九府）在这一阶段人口都稳步增加，但增长率的变化是彼此相对的，当中心区的人口增长率加快时，乾隆四十至五十年（1775—1785），边缘区的增长率就缓慢了；但当中心区的增长率缓慢时（1785—1790年和1800年以后）边缘区的增长率就加快或保持稳定；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以后，当地区的人口增长周期肯定地走下坡路时，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增长率才一致起来。"[54]李先生所揭示的云南人口的变化情况与云南绿营兵分布变化情况（尤其是汛塘的分布变化情况）大体一致，即：乾隆五十年以前，云南人口增长和绿营兵的分布都以中心地区最为突出，其后当边缘地区成为云南绿营兵分布驻扎之重点时，其人口增长率也加快或保持稳定，内地的绿营兵驻防额和居民人数相对减少或停滞。这种一致性，充分反映出云南绿营兵丁本身及其家口的迁移、云南绿营兵对边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对云南移民产生、发展，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迁徙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总而言之，从云南的情况看，绿营兵与移民有着必然的联系性，绿营兵所引发的三种类型的移民构成了清代云南移民的重要部分，并对民间移民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因此，绿营兵应是我们探讨清代移民并进一步认识清代边疆巩固、民族发展问题的新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承业师林超民教授指教，谨致谢忱！

---

①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232页。

②《绿营兵志》，第12页。

③《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二八。

④《清世宗实录》卷三三，雍正三年六月丁亥条。

⑤蔡毓荣《酌定全滇营制疏》，见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七十《武备志》。

⑥陈文学《为请详议调度滇省兵将事题本》，见《平定三藩时期御史奏章》，刊于《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⑦按：汛、塘是绿营兵营制之下两个分防驻扎的基层单位，详情参阅拙著《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见《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蔡毓荣《分定增兵疏》，见《续云南通志稿》卷七十《武备志》。

⑨其编制和兵数系笔者据康熙、雍正、道光《云南通

志》之“兵制”或“兵防”整理统计。
⑩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
⑪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
⑫并见《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顺治十七年七月戊午条。
⑬《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元年二月癸丑条。
⑭《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九,康熙十八年二月辛巳条。亦见《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
⑮《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八,康熙十九年正月戊午条。
⑯《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一,康熙十八年六月戊辰条。
⑰《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八,康熙二十年十月甲辰条。
⑱《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康熙二十年正月丙寅条。
⑲《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⑳《清史编年》第二卷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503页。
㉑《清高宗实录》卷八零三,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乙卯条。
㉒《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五,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丁巳条。
㉓《清高宗实录》卷八零五,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卯条。
㉔《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七,乾隆三十四年正月甲辰条。
㉕《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一,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壬申条。
㉖《清高宗实录》卷八零五,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卯条。
㉗按:马兵月给饷银一两九钱,较步兵之一两四钱五分、守兵之九钱七分优厚。
㉘《清高宗实录》卷八零九,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癸酉条。
㉙《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六,乾隆三十五年四月辛酉条。
㉚《清世宗实录》卷六六,雍正六年二月癸巳条。
㉛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兵制下》;《清世宗实录》卷一零六,雍正九年五月戊寅条。
㉜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兵制下》。
㉝傅恒等奏《裁改镇营事宜》,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三,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壬申条节略收录。
㉞《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五,乾隆四十年六月壬寅条。
㉟光绪《顺宁府志·武备志二·戎事》。
㊱光绪《顺宁府志·武备志一·兵制》。
㊲笔者据道光《云南通志·地理志·关哨汛塘》统计。
㊳转引自《绿营兵志》第229—230页。
㊴《清世宗实录》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乙巳条。
㊵《清世宗实录》卷七二,雍正六年八月甲辰条。
㊶《清世宗实录》卷一零六,雍正九年五月戊寅条。
㊷《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三,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丁卯条。
㊸《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㊹笔者据康熙、雍正、道光《云南通志》之“兵制”或“兵防”统计。
㊺笔者据康熙、雍正、道光《云南通志》之“兵制”或“兵防”统计。
㊻据李中清先生《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一文统计计算,乾隆四十年云南经济中心区的户均人口数为4.84人,边缘地区为4.88人,平均每户人数为4.86人。考虑到一般移民户户均规模较小,故取此时云南平均人口数之下限为计算标准。见《清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1页。
㊼见《清世宗实录》卷一零六,雍正九年五月戊寅条。
㊽据李中清先生统计,云南自乾隆四十年至道光五年期间的户均人口数,最多时达5.44人,最少为4.72人,我们酌以5人计人。见《清史论丛》第五辑,第81页。
㊾笔者据道光《云南通志·地理志·关哨汛塘》统计。
㊿见《清史论丛》第五辑,第71页。
51见道光《云南通志》卷五七《田赋一》。
52方国瑜《农作物良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222-1228页。
53蔡毓荣《筹滇十议疏·议理财》,见康熙《云南通志·艺文三》。
54郭松义《清代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徙》,见《清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5见《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170页。
56道光《普洱府志》卷九《风俗》。
57民国《昭通县志》卷十《种人志》。
58见《清史论丛》第五辑,第80页。